

中国经济学博士论丛

ZHONG GUO JING JI XUE  
BO SHI LUN CONG



# 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 特征与演变趋势

● 凌 涛 著 ●

ZHONG GUO  
TONG HUO PENG  
ZHANG DE TI  
ZHI TE ZHENG YU  
YAN BIAN QU SHI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  
特征与演变趋势

凌涛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

责任编辑：苏耀彬

电 话：68353705

封面设计：金 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特征与演变趋势/凌涛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1

ISBN 7-5017-4137-9

I. 中… I. 凌… III. 通货膨胀-研究-中国 IV. F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014 号

**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特征与演变趋势**

凌 涛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875 印张 14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ISBN 7-5017-4137-9/·2993

定价：10.00 元

## 引 言

### 一、中国通货膨胀的特殊性

通货膨胀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经历了长期总结和深入研究但仍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经济难题。中国也不例外。转轨以来中国经济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困扰。中国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和总结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处在比较初步的探索过程之中，尚不能形成具有很强针对性和解释力的中国通货膨胀理论。这部分地是由于中国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特殊性的认识和理解；部分地是由于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特殊性给中国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造成了认识和理解方面的困难。

产生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特殊性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种通货膨胀不但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发生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种通货膨胀不但发生在一个经济转轨国家。而且发生在一个采取了渐进改革方式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由此造成了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中既存在着公开性通货膨胀，又存在着隐蔽性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中既有政策类因素，又有体制类因素，还有发展类因素。因而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金融宏观调控既要针对公开性通货膨胀采取措施，又要针对隐蔽性通货膨胀采取措施。

所以，在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需要分析公开性通货膨胀，更需要分析隐蔽性通货膨胀；不仅需要从政策角度进行解释，更需要从体制角度和发展角度进行解释。我们不能说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具有通货膨胀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说，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更需要把通货膨胀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在发展中进行渐进转轨的特殊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作出具有说服力和针对性的理论阐述。

然而，要达到这个研究目的毕竟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所作的努力和所要达到的研究目的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要缩小这个差距还需要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如果我们所作的努力能够溶入这种共同努力之中，并起到填沙铺石的作用，也就足以心慰的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目的。

## 二、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

根据研究目的的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和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 （一）实证性

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是在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偏重于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概括和归纳，即从经济现象出发，总结和分析其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后者偏重于对经济规律的推理和演绎，即从已有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所发生的各种经济现象加以阐述和解释。在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这两种研究方法都是需要的，但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有所侧重。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更需要强调和突出实证研究方法。因为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研究通

货膨胀问题的共同性规律，而是为了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特殊性规律。因此，必须以对中国通货膨胀现实问题的概括和归纳为基础，才能更好地总结和分析其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

## （二）相关性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的相关性是指任何事物都与其它事物之间存在着联系，因此，必须把一个事物放在与其它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注重一般意义上的相关性之外，还更加注重相关性的两个特殊含义。一个含义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与之相关的事物的性质也会有所不同。另一个含义是，由于研究对象不同，与之相关的事物的范围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经济体制比较稳定的国家，通货膨胀问题和供求状况及金融调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表现为政策关系，并且是相对直接的关系；而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要的关系，并且是相对间接的关系。但是，中国通货膨胀问题和供求状况及金融调控之间的关系，则不但表现为政策关系，而且更表现为体制关系和发展关系，甚至相对来说，体制关系和发展关系是更直接的关系和更主要的关系。因此，我们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相关性，而且更是在特殊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相关性。

## （三）连续性

从事物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看，连续性和阶段性是相对的概念。离开了连续性，阶段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然而，离开了阶段性，也就无法组成连续性；因此，连续性和阶段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在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过程中，把转轨以来和继续转轨的进程划分为两个大阶段，又把转轨以来划分为前后连接的三个小阶段，把继续转轨进程划

分为前后连接的两个小阶段。但是需要指出，这种划分只是出于分析问题和阐述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在强调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阶段性。恰恰相反，我们始终强调的是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连续性。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轨过程之中，并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处在转轨过程之中。从整个转轨过程来看，其中的阶段性特征只不过具有极为短暂的过渡性意义。从更加长远的观点来看，整个转轨过程也只不过具有阶段性的意义。

上述三个特点实际上都是实证研究方法所具有的特点，所以，我们把实证研究方法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 三、研究结构安排

我们的研究结构共安排了三篇九章。其中第一、二篇是把中国经济转轨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篇是把中国经济继续转轨进程中的通货膨胀作为研究对象。

第一篇包括第一、二、三章。主要是分析转轨以来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第一章是分析转轨以来供求总量状况的基本变化。主要是通过分析供求状况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揭示供求状况变化的基本特征。第二章是分析转轨以来金融调控的基本变化。主要是通过分析信贷政策的变化与货币政策的变化，揭示金融调控方式变化的基本特征。第三章可以说是第一篇的核心内容。该章是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货币超量供给的三种基本类型，揭示转轨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主要成因及其表现程度。

第二篇包括第四、五、六章。主要是分析转轨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阶段特征及其成因。第四章是分析 1979~1985 年，这

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分配冲突型通货膨胀。该章首先分析了引起国民收入分配冲突的主要原因；其次分析了协调国民收入分配冲突的主要方式；最后分析了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冲突所引致的通货膨胀。第五章是分析 1986~1990 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主体扩张型通货膨胀。该章首先分析了各主体利益的形成和扩张；其次分析了各主体利益扩张行为的传导方式；最后分析了由于各主体利益扩张行为所引致的通货膨胀。第六章是分析 1991~1996 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投资主导型通货膨胀。该章首先分析了投资主导型的含义；其次分析了投资主导型的形成和成因；最后分析了投资主导型需求扩张所引致的通货膨胀。

第三篇包括第七、八、九章。这篇是在前两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继续转轨进程中通货膨胀的演变趋势。第七章是分析供求状况的演变趋势。主要是通过分析供求状况影响因素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来分析供求状况的基本演变趋势。第八章是分析金融调控的演变趋势。主要是通过分析直接金融调控方式作用的演变和间接金融调控方式作用的演变，以及金融调控方式依存条件的演变，来分析金融调控演变的基本趋势。第九章可以说是第三篇的核心内容。该章是在前两章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今后继续转轨进程中，中国通货膨胀演变趋势可能呈现的基本特征和阶段特征，以及关于治理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思路的若干思考。



## 第一篇 对中国通货膨胀体制特征的基本分析

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的转轨过程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对这个过程进行更为具体的阶段划分和特征分析之前，我们先把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并和转轨前的过程进行异同比较研究，以便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体制特征作出基本分析，并为进一步分析转轨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阶段特征奠定必要的基础。

在这篇里，我们首先从影响通货膨胀的供求状况入手进行分析。一般认为，供求状况是经济政策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运行所呈现出来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供求状况更主要的是经济体制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轨前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经济转轨以来的基本特征。因为，转轨以来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尚未达到实质性转变的程度。

其次我们再对同样影响通货膨胀的金融调控进行分析。转轨前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财政手段进行调控，金融手段所起的调控作用很小。转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对中国经济起主要调控作用的已经变为金融手段。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转轨以来金融手段在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财政化倾向，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手段，实际上它是财政与金融混合的调控手段。这一特征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进程所决定的。

最后我们通过对转轨前后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政策选择型货币超量供给是转轨前单一经济主体条件下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转轨以来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了需求压力型货币超量供给，但是政策选择型货币超量供给依然存在，所以转轨以来通货膨胀的程度表现得比转轨以前更为严重。

## 第一章 经济体制演变对供求状况的基本影响

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供求状况的经常性状态，主要不是因为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当然并不排除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转轨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由于这种变化尚未达到实现经济体制基本转变的程度，所以中国供求状况的这种经常性状态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 一、影响供求状况的三类因素

通货膨胀受到供求状况的影响，因此，供求状况的影响因素也是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我们把供求状况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一类是政策类因素。政策类因素主要是指各种政策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等。在计划经济中主要包括各种计划手段，如生产计划、分配计划、价格计划、信贷计划等等。在转轨经济中则市场政策和计划政策都起作用。受政策变化的影响，供求状况会发生变化。一类是体制类因素。体制类因素包括各个方面的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包括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价格形成体制、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等微观经济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中主要包括财政、金融、收入分配、价格、企业等各个方面的计划管理体制。在转轨经济中则

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起作用。受体制变化的影响，供求状况也会发生变化。一类是发展类因素。发展类因素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无论是在市场经济中，还是在计划经济中，经济发展过程都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产业结构的变化、产品结构的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等等。受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供求状况同样会发生变化。

这三类影响因素在对供求状况具有影响作用的同时，在这三类影响因素相互之间也具有影响作用。这三类影响因素对供求状况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制相当稳定的条件下，对供求状况的影响作用主要来自于政策类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体制相当稳定的条件下，对供求状况的影响作用则分别来自于政策类因素和发展类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体制不稳定的条件下，对供求状况的影响作用则分别来自于政策类因素、体制类因素和发展类因素。这三类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政策类因素与体制类因素之间的关系上，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现存经济体制决定现实经济政策，现实经济政策不可能超出现存经济体制的制约范围发挥作用。但是，在这两类因素与发展类因素之间的关系上则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可以存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而现存经济体制和现实经济政策，也可以与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二、区别不同的供求状况

供求状况是指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处于均衡状况还是处于失衡状况。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均衡状况时，对物价水平不产生影响；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失衡状况时，对物价水平产生

截然相反的影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状况影响物价水平下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影响物价水平上升，即发生通货膨胀。在市场决定价格的条件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所引发的是公开性通货膨胀；在计划决定价格的条件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所引发的是隐蔽性通货膨胀；在从计划决定价格向市场决定价格转轨的过程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所引发的既有公开性通货膨胀，也有隐蔽性通货膨胀。

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状况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状况，还可以划分为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和总供给过大于总需求两种不同程度的失衡状况。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还可以划分为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过大于总供给两种不同程度的失衡状况。因此，更加确切地说，通货膨胀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的必然反映；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总需求过大于总供给的严重失衡状况的必然反映。

对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的影响因素，既可以从需求方面进行解释，也可以从供给方面进行解释。从需求方面来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可以解释为总需求过大；从供给方面来看，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可以解释为总供给不足。由此可见，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况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因素是总需求过大，另一个因素是总供给不足。那么，如何对总需求过大和总供给不足加以区分呢？从理论上说，可以用社会经济资源和生产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通常称之为生产可能性边界或潜在总供给）来加以区分。假定总需求为  $\Sigma D$ ，总供给为  $\Sigma S$ ，社会经济资源和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经济规模为  $H$ 。当  $\Sigma D > \Sigma S$ ，而  $\Sigma S = H$  时，即  $\Sigma D > H$  时，则意

意味着总需求过大；当  $\Sigma D > \Sigma S$ ，而  $\Sigma D = H$ ，即  $\Sigma S < H$  时，则意味着总供给不足。

### 三、转轨前后需求状况的基本变化

社会总需求包括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

#### (一) 国内需求影响因素的变化

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 1. 投资需求影响因素的变化

转轨以来，在中国投资领域里，投资政策尚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投资规模扩张仍然表现为投资政策的基本倾向。投资增长压力迫使投资发展仍然呈现出赶超特征。然而，投资体制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尚未达到在投资领域里形成市场机制的程度，但是，却给投资需求状况带来了很大影响。转轨以来，中国投资体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分散投资审批权限。

和转轨前投资审批权限高度集中于国家主体的状况相比，转轨以来，投资审批权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主体分散给了部门、地方和企业等各个非国家经济主体。国家对投资审批权限分散的程度，有时会随着对社会投资规模控制的松紧程度而发生变化。如当国家认为社会投资规模过大的时候，就会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而集中投资审批权限；当国家认为社会投资规模不大的时候，就会为了更有效地鼓励和扩大投资规模而分散投资审批权限。尽管转轨以来投资审批权限经历了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反复过程，但是，总的来说，投资审批权限还是呈现出以分散为主的基本演变趋势。从而形成了目前由国家主体继续控制较大项目的投资审批权限，而非国

家经济主体则已经控制了较小项目的投资审批权限的基本格局。

转轨以来，国家把投资审批权限分散给地方、部门和企业。但是，地方和部门同样是政府机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那么，国家主体分散投资审批权限的过程，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政府职能的内部替代过程。可惜事实还不仅如此。政府职能的内部替代仅指在政府机构体系内，一个机构的职能被另一个机构所替代，这里所发生的主要是行政职能的替代，基本上不存在经济利益关系。但是，在国家分散投资审批权限的过程中，不但使原来由国家主体行使的投资审批权限部分地改由非国家主体行使，从而发生了政府行政职能的内部替代；而且也使原来由国家主体占有的投资收益部分地改由非国家主体占有，从而改变了经济利益关系，使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也发生了重新组合。

如果政府行政职能的替代和经济利益格局重组结合在一起，则只会产生行政体制的变异，而不会产生经济体制的变异。而一旦政府行政职能的替代和经济利益格局重组结合在一起，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不仅会引起行政体制的变异，同时也会引起经济体制的变异。下面的分析将表明，正是这种经济体制变异给投资需求状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 （2）开辟多种融资渠道。

财政预算资金曾经是转轨前最主要的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和财政预算资金相比，预算外资金只是一条十分次要的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其它资金渠道则更是微乎其微，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转轨以来投资资金的融资渠道迅速多元化。首先，是预算外资金迅速增长，大大提高了非国家主体自筹投资资金的能力。其次，是随着投资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信贷

资金迅速介入投资领域，并以极快的增长速度成为占居首位的投资资金来源渠道（这里还要考虑到在所谓自筹投资资金中实际上有相当大的比例也是来自于信贷渠道）。再次，是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外商投资迅速增加。外商投资中以资金投资的部分直接形成国内投资需求；以设备投资的部分也要求一定比例的人民币配套资金，从而间接形成国内投资需求。此外，个人投资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一条不可忽视的投资资金来源渠道。

转轨以来，在开辟上述多种投资资金渠道的基础上，还发生着更进一步的融资多元化趋势，其中，以信用融资多元化最为典型。最初，投资领域的信用融资只是由国有银行提供信贷资金。但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主要是提供给国有企业。而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转变，迅速成长的非国有企业也提出越来越大的融资要求。为适应这种转变，发展起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多种非银行金融机构；为适应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发展起一批政策性银行；为吸收社会各方面资金进行集中投资，发展起一批证券投资机构，如投资基金、股票市场等。这样，投资领域的信用融资就从最初的由国有银行提供信贷资金的单一渠道，演变为后来的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又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投资等进一步多元化的融资格局。

转轨以来，随着投资资金的融资渠道向多元化转变，投资收益也在向多元化转变。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投资收益向多元化转变，融资渠道向多元化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各投资主体之所以愿意提供投资资金，主要是因为可以获得投资收益。这里固然不能排除投资收益中存在着非经济成份，如地方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员为牟取政绩而热衷于投资。但如果没有投资经济收益，则地方官员或企业主管人员也可以通过其它途



径牟取政绩，而不必热衷于投资。而且，融资渠道多元化以后，非国家主体仍然热衷于从国家主体获取投资资金。这不仅仅是由于非国家主体的投资资金较为匮乏，更主要地是由于国家主体的投资收益虽然归国家所有，但只要拥有了国家投资，就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国家投资的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这同样可以给非国家主体带来经济收益。况且，国家投资无论是来自于财政资金，还是来自于信贷资金，最终都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因而长期占有和支配国家投资资金几乎无任何风险，这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收益。

投资体制所发生的上述变化都没有脱离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市场投资机制仍未形成。也就是说，缺乏投资需求约束仍然是转轨以来投资体制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基本特征的存在，才导致投资体制的上述变化对投资需求产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投资效益产生的影响作用；即对投资规模扩张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刺激作用，而对投资效益提高产生的影响作用却十分有限。

本来上述投资体制的变化有利于发挥非国家主体的投资优势，因为非国家主体在局部投资方面掌握着比国家主体更为准确详细的信息，这样就可以使局部投资与全局投资更好的衔接起来。但是，由于缺乏市场投资机制，结果投资体制的上述变化却为非国家主体牟求局部利益提供了机会。以致非国家主体可以只顾局部利益，即使在局部投资项目与其它局部投资项目，甚至与全国投资项目形成重复建设，哪怕是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的情况下，只要能够获取到局部投资收益，也会在所不惜，毅然上马。这样就形成了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尤其是在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由于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导致的生产能力闲置，会造成资源状况更加紧张。